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虎门销烟



## 虎门销烟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巍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的四周是一组巨型汉白玉浮雕。它铭刻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辉煌历史，记载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怀念和敬仰。其中，第一幅表现的是一百五十七年前，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壮举——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当时，资本主义英国为打破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贸易的限制，变中国为它的商品市场和殖民地，进行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结果，烟毒泛滥中华，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危在旦夕。由于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内部禁烟态度不一，所以弛禁与严禁斗争日趋激烈。民族英雄林则徐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抱定“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的宗旨，以正直廉洁的作风和英勇无畏的气概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

历史，永远铭记这一切。

人民，不仅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英雄们树立了一座高大雄伟的纪念碑，而且也在心中为英雄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下面，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顾虎门销烟——中华民族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一页。

## 一、闭关自守的大清王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汉唐以来，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唐宋之后，尤其注重海外贸易，元朝统治时期，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她的声誉遍及欧、亚、非各大洲。到明朝时，明政府沿袭了前代对外贸易的传统和体制，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事务，大批使臣被派往国外，并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壮举。

当时，明朝人以今婆罗洲为界，其西称西洋，其东称东洋。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率领一支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船队，乘坐当时海上最大的航行船只，满载金银、绸缎、瓷器和铜铁器等珍贵货物，七次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为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外国的科技、文化也随着中外交往源源东来，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跨入16世纪时，随着欧洲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前驱的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掠夺。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

1514年，葡萄牙人自西向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我国的东南沿海骚扰。此后，来华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岛屿及福建泉州、浙江宁波等地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无所不为。一位名叫西蒙安刺德的人甚至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上擅自植木堆石，设置绞架，作为贸易基地。葡萄牙殖民者的强盗行径激怒了中国政府。1523年，明朝军队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了葡萄牙商船，并缴获了佛郎机炮。从这一年开始，明朝政府严禁与葡萄牙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36年后，葡萄牙人又借口船上货物浸水，需借地晾晒，经重金贿赂广东官吏，租下了澳门。自此，葡萄牙人在澳门建屋居住，长期盘踞。

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者也接踵而来。同葡萄牙人一样，他们

是以商人兼海盗的身份同中国人相见的。

西班牙人于 1575 年抵达福建，与中国通商，不过人数不多。可是在此以前，西班牙已占领了中国的邻国菲律宾。中国与菲律宾早有贸易往来，并有大批华侨在菲律宾侨居。西班牙殖民当局对中国华侨百般排斥凌辱，1603 年竟下令对华侨血腥屠杀，死难者达 25000 人。之后，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屠杀。

荷兰政府在 1622 年派列也尔森率武装商船 15 艘，驶到澳门海面，以 800 人强行登陆，企图武力闯入广东，结果战败，其残部转入澎湖，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据点。1624 年，中国将荷兰人驱逐出境。可是，他们不久又转据台湾，并在那里建立了赤嵌城。直到 1662 年，台湾人民在郑成功领导下，把荷兰人赶走了。

英国自 16 世纪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就积极东进。1600 年，英国成立了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1637 年，英国人威得尔率船到达中国，企图在澳门活动。澳门的葡萄牙人恐怕英国人来后与自己竞争，多方阻挠。英船于是径驶广州珠江口，中国炮台守军发炮示警，令其停止前进，威得尔不听，并发动进攻，强行占领炮台，放火烧毁了附近的村庄，将船驶进广州。在那里，他们售出了带来的货物，装上了当地的蔗糖和生姜，然后扬长而去。

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看到这些来华的西方人并不全是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而多为非牟利的不法之徒。为防范他们在中国沿海劫掠和骚扰，并隔断中国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维护其统治，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并不是完全禁止贸易，而是用系统的规定来限制贸易的扩大。这种政策，突出表现在清朝乾隆、嘉庆时期。

1757 年，乾隆皇帝传谕外国商人，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不准到其它地区贸易。从此，广州单一口岸通商的贸易体制，直到鸦片战争前没有什么变化。

1760 年，清朝政府批准成立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公行，规定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必须通过公行进行。

公行，也称“十三行”（最多时达 24 家，最少时仅 4 家，并非固定 13 家），是经过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作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商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这样一来，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而仅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管理行商的办法，对来华外商进行限制，例如：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留居广州，必须住在公行设立的商馆内；外商不得私雇买办；禁止外国妇女入城；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外国兵船进入内港等。

对国内，清政府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实行了一些限制政策。如曾颁行限制火药、硝磺、钢铁、粮食、丝绸、金银等数十种重要商品出口；限制中国商人建造大型船只出海远航；排斥西方工业产品和科技文化等等。

清政府这种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

力。当时，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交换。正如乾隆皇帝在 1793 年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时的中国政策，并不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互通有无的需要，而看成是天朝上国对外国人的一种“恩赐”。

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还在于：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高度发展，要求它的统治者防止商品经济对原有经济基础的破坏作用。就连历史上较为开明的康熙皇帝也不例外，他曾亲绘“耕织图”，表示对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钟爱。当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重农抑商”下的闭关政策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统治者的虚骄自大。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养成了一种虚骄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的上国，别国都是“夷狄蛮貊”。时至 18 世纪，世界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却毫无所知。许多封疆大臣甚至弄不清英国在天南还是地北。对此魏源写诗作了辛辣的讽刺：

“为问海夷何自航，  
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  
岛夷通市二百载，  
茫茫昧昧竟安在？”

面对祸在眉睫的外国侵略，君臣们仍然认为闭关锁国便可无事，而结果却是面临被动挨打的惨痛局面。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作恶多端的不法商人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策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和侵略分子。

闭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恶劣后果，它使国民的耳目愈来愈闭塞，思想愈来愈保守，并失去了及时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长处的机会，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不看世界大势，盲目自满，不求进步，与西方的差距愈来愈大。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毫无疑问地要把古老的中国卷入到世界经济的漩涡中去。

## 二、“世界霸主”觊觎中国

广州单一口岸的贸易体制，对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是十分不利的。

英国资产阶级在 17 世纪中叶，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后，先后打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1769 年，英国人瓦特完成了他所改良的第一台蒸汽机，使工业动力不受自然资源的限制，而完全由人支配。蒸汽机的运用，在工业生产上引起了决定性的革命，即产业革命。蒸汽机首先应用于纺织行业，之后扩大到机器制造、运输、冶金、煤炭等。到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完成了以大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进程。据统计，从 1788 年到 1830 年，英国棉

纺织品生产增加了3倍,生产成本和工业品的价格降到1/10至1/20。(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3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它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扩大海外殖民地,以便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猎取的对象。

自1637年英国人威得尔率船队来华,到19世纪上半叶的二百年间,英国对中国的正当贸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货物是呢绒、棉布等纺织品。由于中国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过着男耕女织的贫困生活,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土布,所以对既不结实,也不便宜的洋布并不欢迎。英国棉纺织品在中国的销路不大,有时还得亏本减价出售。仅18世纪的最后5年,年平均亏本就达19万银两。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其工业品生产量迅速增加,机制纺织品的价格下落,大量输入中国,但始终打不开中国市场。英国运来的第二种大宗商品是铅、锡、铜等金属品,然而销路有限,年获利不过数千银两,有时也得亏本。唯一能够获利的,是从印度转贩的棉花。可是,总的算来,仍然抵不过棉毛织品的亏损。据1820年统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销售英国产品的净亏损额,在前23年中共约169万镑。

与此同时,中国的茶叶、生丝、大黄等在英国市场上十分畅销。特别是茶叶,到18世纪后半期,已成为英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输入量成倍增加。

英国资产阶级不能向中国输入足够的商品,只能用大量的现银弥补贸易逆差。18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所装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白银,商品不足十分之一。在18世纪的一百年间,英国输入到中国的白银达两亿多元。

惟利是图的英国商人及其政府,当然不甘心每年把大量白银运往中国。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政府两次遣使来华。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当他在热河行宫万树园正式觐见乾隆皇帝时,向皇帝提出了以下要求:1、派人来北京办理商务,并在北京设立商馆;2、在宁波、舟山、广州、天津等地自由贸易;3、请求占用舟山附近海岛一处,留居商人,设立贮货站;4、减免货物税或减轻税额;5、请求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6、允许英国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结果,马戛尔尼的要求全部遭到拒绝。乾隆皇帝在致英国女王的信函中指出,马戛尔尼“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宣告“若将来船至浙江、天津,请求上岸贸易,守土文武必不令其保留,立时驱逐”。

马戛尔尼的出使一无所获。然而,英国政府仍不就此罢休,20年后再度遣使前往中国,这就是1816年阿美士德的出使。他的具体使命同马戛尔尼一样,是力图减轻中国政府对广州贸易的限制;取得驻使北京的允许;要求开放广州以北的港口等等。1816年7月28日,阿美士德到达天津口外,8月29日到达北京,因拒绝按照中国方面的礼仪,以三跪九叩大礼觐见嘉庆皇帝,被皇帝当日遣回。阿美士德出使又告失败。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华贸易的需要,殖民主义者的侵华要求日益迫切。他们积极寻找一种既能为中国方面接受,可用于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这种商品在印度找到了,它,就是鸦片!

### 三、源源东来的特殊“商品”

鸦片亦称“阿片”，俗称大烟，又名阿芙蓉，是用罌粟汁液熬制而成的，出产于印度和小亚细亚。公元8世纪，作为药材由阿拉伯少量输入。它有提神、止泻、镇痛、辟瘴的医疗效用，但也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人们一经吸食，容易上瘾，难以戒绝，一天不吸便会浑身瘫软，涕泪横流，久而久之，就会精神萎靡，丧失劳动力，直到死亡。

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都不大。英国自18世纪20年代开始经营这项贸易，但后来居上，发展很快。最初，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过200箱（每箱120斤）。18世纪中叶，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主要产地孟加拉后，年输华鸦片激增到1000箱。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最关键的一年。在这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正式确定了鸦片贸易政策，并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当时，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曾这样阐述其鸦片贸易的原则：“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由此可见，英国一方面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格限制它的消耗，另一方面为了“对方贸易”，包括对华贸易，又积极鼓励外销。历任英属印度总督，在鸦片贸易上所奉行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原则。

189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鸦片制造权。这样，从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罌粟，到加工制成鸦片直到在加尔各答市场上公开拍卖，都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揽垄断。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惊人暴利。1813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为237卢比，而它的拍卖价格却为2428卢比，利润高达9倍以上。其中，东印度公司获利最大，约得三分之二，其次是英属印度政府，其抽税税率为鸦片成本的301.75%，1828年到1830年，从鸦片专卖中所取得的收入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其全年财政收入的1/10。

罪恶的鸦片贸易，使英国资产阶级扭转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等人，在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高兴地说，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鸦片一项就占了337万英镑，抵销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314万英镑还有余。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美滋滋地赞颂鸦片贸易的好处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喜气洋洋，人丁兴旺的景象，使英国产品对印度的输出大为扩张，使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鸦片贩子更是在这一非法贸易中大发横财。例如1817年，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则高达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扣除少量运费及其他支出，剩下的部分就是鸦片贩子们的纯利。

自从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后，鸦片贩子打着“自由贸

易”的旗号，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他们把鸦片从印度偷运到中国后，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到中国烟贩的现金，坐收暴利。正如大鸦片贩子查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称，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每箱高达 1000 银元。非法的鸦片贸易，使查顿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光棍汉变为拥有百万英镑财产的富翁。

鉴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清政府多次颁令禁烟。早在 1729 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第一道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那时，鸦片输入中国每年不过 200 箱，鸦片之祸好比涓涓细流，如认真堵塞，犹不至溃决难治。但是这次禁烟却留下了很大漏洞，就是允许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并通过公行公开销售。乾隆期间，又曾发布禁令，但毫无效果。1796 年，嘉庆皇帝再颁禁令：停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以后又三令五申，严格禁止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贸易。但正像英国人自己所供认的，“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他们从此转而采取走私的办法了。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手段，将鸦片囤储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浦，在船边私卖。

1821 年，道光皇帝继位后重申禁令，严禁在澳门黄浦囤放和销售鸦片。英国烟贩得讯后，便在珠江口岸的伶仃洋建立起新的走私据点。那里日夜停泊着二十多艘趸船，存放海外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还勾结广州的地痞，以开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这种黑店称“大窑口”。中国烟贩到“大窑口”，交付现银取得提货单，凭提货单到趸船取货。提出的鸦片由专门包办武装走私的船只——“快蟹”和“扒龙”等运回广州“大窑口”。然后再由内地的烟贩偷运到各地的“小窑口”。这样，英国鸦片贩子以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为总毒窟，向中国内地撒开了鸦片走私网，使鸦片输入猛增，到 1839 年全年偷运量增到四万多箱。英国在鸦片战争前的 40 年中，总计运进中国的鸦片有 42.7 万箱，从中国掠走白银达 3.5 亿元。

在非法的鸦片贸易中，美国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住在广州的美国商人，除奥立芬洋行一家外，全部是鸦片贩子。一个美国波士顿的烟贩说：从 1821 年到 1824 年，他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价值一百万银元以上的丝绸和棉布等商品，却从来没有装运过一枚西班牙银元到中国。美国贩毒集团为适应大规模走私的需要，还建造了许多“飞剪船”。这种船只船身狭长，长浆密布，很像一条蜈蚣。它航行的速度非常快，船上还装备了大炮等武器，当遇到中国水兵巡查时，就发炮射击，逃窜而去。

此外，俄国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也从中亚地区向中国输入鸦片。

鸦片走私给英、美、俄等国带来了巨额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 四、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

对于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并不满足。他们采取鸦片输入和军事侵略双管齐下的方针，企图用鸦片和大炮的双重威力打破中国对外贸易的限制。

1832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让本公司的广东商馆职员林赛化名为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号船的船主，又派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做他的助手，对中国进行侦察活动。郭士立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兼医生，多年从事鸦片走私活动，



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汇集了七十多人，自澳门出发，到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活动。每到一地，他们就打着“通商”的旗号，向当地人们递上一份传单，以及《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要求进行贸易。他们还以替人治病为名义收买人心，引诱人们信教，暗地里，却派人沿途测量河道和港湾，绘制航海图；了解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商品贸易的情况；刺探中国方面驻扎军队、武器装备等军事机密，并一一做了详细记录。

胡夏米的这次行动，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情报。他们通过观察，了解到了中国沿海装备废弛等详情：各地炮台年久失修，有的既无人驾炮，也无人守卫；有的炮台质量很差，不堪一击；中国士兵装备简单，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或者一杆矛，或者一支火枪；中国的战船也没有多大战斗力。尤其是胡夏米一行乘船闯过甬江后，深叹宁波守军连阻止一支商船进港的能力都没有。为此，他们得出结论说：“清朝的国力十分虚弱，秩序非常紊乱，采取商议的办法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对中国必须采用武力征服。整个中国舰队，也不敌一艘英国战舰。”不久，胡夏米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了武装进攻中国的办法：“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够对付中国了。船上载运六百人，以炮兵为主，以便登陆作战。”

当然，胡夏米的报告，不免有浮夸不实之处，但它却为后来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

巴麦尊接受了胡夏米的意见，一方面极力主张英国政府对华作战；一方面对英国政府派往中国管理对华贸易的商务监督律劳卑下达指示：1、大力推销鸦片，不要干涉鸦片走私；2、开辟商埠，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发展英国的商业势力；3、在中国沿海寻找适当地点作为海军基地，以便在发生敌对行为时，保证海军的安全。

律劳卑是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后，第一个具有女王使节身分的驻华商务监督。1834年7月，律劳卑到达澳门，成立了驻华商务监督处。律劳卑声称：“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指清政府），必须以实力为后盾”，“中国政府外强中干，使用武力威胁，比用外交手段收效大”。因此，他一到中国，便无视中国主权。

按照清政府的外交惯例，澳门是葡萄牙人租借地，允许外国人进出居住。但如果从澳门进入广州，则必须领取获准入口的“红牌”。外国人需要与广东官府交涉，则一律采用禀帖说明，由行商代为转达。律劳卑认为自己是英国政府官员，不愿遵守旧规。他未申请红牌就蛮横闯入广州，并违反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惯例，坚持直接与两广总督公函往来。9月2日，两广总督卢坤以律劳卑“不遵法度”，下令照例封舱，即停止贸易。5日，律劳卑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护英商及其财产为名，命令停泊庄外洋的两艘英舰强行间入珠江。7日，英舰顺潮闯入海口，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不久，又闯过大虎炮台，进抵黄浦。在黄浦抛锚后，英舰陷于清军包围之中，而清政府的封舱之举又使英国商人的利益受损。不得已，律劳卑放弃进攻退回澳门。10月，律劳卑在澳门病死。

1836年，查理·义律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两年前随律劳卑来华，曾先后充任船务总督、监督处秘书、第三监督、第二监督等职，他了解中国情况，力主维护鸦片贸易，用武力征服中国。就职的当天，为了去广州探听虚实，他权且用禀帖的形式领取红牌，作为入境凭证，

前往广州，在广州活动了7个月之久。然后，他充满信心地向巴麦尊报告：“不管实际的禁令是怎样的严厉，我仍认为鸦片贸易合法是可以盼望的”，建议英国政府“必须使用武力，声言只要有一艘军舰到达白河口，就可以使清朝皇帝作出让步”。于是，1838年7月，巴麦尊派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少将率领“威里士厘”号、“拉尼”号、“阿吉林”号三艘军舰来到中国沿海，准备从事武装挑衅。然而这时广东水师关天培等已经在虎门设防把守。马他仑担心有可能出现不利的结局，未敢贸然行动。

上述情况表明，在罪恶的鸦片贸易背后，隐藏着英国侵略者更为险恶的计划——武力征服中国。

中国面临着严酷的斗争形势。

## 五、鸦片烟毒泛滥中华

19世纪30年代，鸦片犹如一股黑色毒流在中国的土地上泛滥、蔓延。就地区来说，烟毒已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内地18省，深入到山西、陕西、盛京等腹地。就组织来说，贩毒机构已经形成。在这个机构中有开馆者、兴贩者和制造烟具者。开馆者不仅限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各城乡市镇。兴贩者不仅有勾结外商、偷漏银元出洋的囤贩户，亦有包揽一乡一镇，乃至一省和数省的鸦片贩卖者。制造烟具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制造的烟枪，以竹木、玻璃、陶器、象牙和金、银、铜、锡等金属为原料。不少烟枪经过点缀雕饰，精致华丽。就吸食来说，其范围之广、人数之众，都是惊人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几乎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吸食者。据183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高达四百万，约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鸦片之害，首先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吸食者一旦上瘾，饭可以不吃，鸦片却非吸不可。吸食既久，则面瘦齿黑，萎靡不振，废时失业，害己害人。不同体质的人在吸食之后，几乎都走上了同样一条由强壮到衰弱、由衰弱到疾病、由疾病到死亡的自我毁灭之路。特别是吸食鸦片的士兵，渐趋失去战斗力的严重局面。当时，有人在一首诗中写道：

“请君莫畏大炮子，  
百炮才闻几人死？  
请君莫畏火箭烧，  
彻底才烧二三里。  
我所知者鸦片烟，  
杀人不计亿万千。”

非法的鸦片贸易，是靠摧残他人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

其次，大大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清王朝的官府衙门中，大部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鸦片有关。他们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在清皇宫的所在地北京，有些烟馆正是官府人员开设的。距北京咫尺之近的天津，也是烟馆林立道旁。烟具陈列街前。

京津的烟馆里，烟雾弥漫。吸食者横卧在床上，手握烟枪，面对鬼火似的烟灯，吱吱地狂吸。这些吸毒者多是夜间过瘾，白天昏睡，成为日夜颠倒的大烟鬼。对于此情此景，爱国诗人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鬼灯队队散秋萤，  
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  
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指出，这些吃喝玩乐的腐朽官吏，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灯客，烟瘾发作时，涕泪横流，一副丑陋模样。诗人讽刺道：这些大烟鬼，何不到盛产鸦片的“花县”去做官呢？

在鸦片走私的集中地广东等处，问题更加严重。鸦片贩子以贿赂的手段收买清朝政府的官员，使他们从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好处。以广东为例，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曾大模大样地声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却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李鸿宾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专以护私渔利。他与洋船商定，每箱鸦片收5元至10元，并从每一万箱鸦片中抽取数百箱交水师“报功”。更有甚者，水师船只竟然代运鸦片入口。结果，韩肇庆不仅未被查处，反而以缴烟有功，晋升为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的水师官兵，也是一片腐败现象，其收入十分之几来自规银。如此腐朽败坏的吏治，怎能阻止鸦片的源源而来？在鸦片毒水的腐蚀下，清政府的贪风更盛，吏治更坏。

第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鸦片输入激增，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量超过1亿元，每年平均约5百万元，相当于中国当时白银流通总额的1/5。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制钱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铜钱，每1枚称1文。18世纪末期，1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七、八百文，而到了1838年，1两白银却可以兑换制钱约1600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将仅有的少量农副产品出售，只能换回制钱，而缴粮纳税又必须折合成银两。银价上涨后，使农民原来卖1石粮食可以缴纳的捐税，非得出卖2石粮食不可。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由于鸦片泛滥，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地被鸦片吸收，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萧条。当时，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广州和江南。广州的行商因银两渐少，生意困难，赔累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商债务，以至破产。如兴泰行和万源行就是因为无力还债而倒闭的。江南地区也同样是一派凋敝景象。1838年，一位清廷大员在长江中下游著名商业区调查以后这样写道：“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鸦片贸易吸去了人们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夺去了普通商人的生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衰败。

白银外流，也致使清政府财源枯竭，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对鸦片输入造成的银荒、兵弱局面，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鸦片问题了。

## 六、弛禁与严禁之争

对如何解决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论争，并逐渐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消极弛禁，一派主张积极严禁。两派意见经过多年酝酿和斗争，终因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的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而拉开了激烈论争的序幕。

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公开提出弛禁主张。他认为，

多年来走私分子的狡诈贿赂和执法官吏的徇私舞弊，使禁烟的法规律令徒具虚文，即使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无济于事。阻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是弛禁，具体做法是：1、准许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2、只准以货易货不许用银购买；3、准许内地百姓种植罂粟，以抵制外来鸦片；4、禁止文武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鸦片，民间吸食一概勿论。

这种妥协苟安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等的支持，赢得了中外烟贩的喝彩。一位外国烟贩称誉说：“这个奏折，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道光皇帝接奏后，将该折提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项、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人议论。结果，邓廷桢等人奉谕回奏，认为弛禁是因时制宜的良策，表示赞同。

弛禁派单从遏制白银外流出发，而未考虑鸦片对民众和社会的危害。这种“饮鸩止渴”的主张遭到了严禁派朝臣的严词斥责。1836年9月11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崧、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在各自的奏文中分析了鸦片输入的危害，指出：昔日荷兰侵略爪哇，首先诱使爪哇人吸食鸦片，使其国贫民弱，然后将其灭亡。现在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也是出于同样目的。针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他们指出：如果不禁止鸦片的销售，岂能禁人吸食？官员、士兵皆出自民间，所谓只禁官兵吸食，岂不是掩耳盗铃？提倡内地种植罂粟，岂非“夺农工而耗本计也”？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实为“绝民命而伤元气也”，“殊失朝廷爱民之心”。许球还旗帜鲜明地主张：将英国著名烟犯查顿、颠地等人“查拿拘守”，勒令其保证不再贩运鸦片到中国来。

以上三篇奏折，理直气壮，有力地驳斥了弛禁派的主张。不过他们只注意到打击鸦片贩卖者，而未提到吸食者的根源问题。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该奏章从国家财政收支的观点出发，痛陈鸦片之害，提出了一个用死刑重治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的严禁方案。他主张，以一年为期，由烟民自动戒绝，过期不戒者，以死罪论处，文武官员违禁，照常人罪加一等，除本人处死外，其子孙不许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为不使人漏网，又提出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个一百年来最彻底的禁烟主张，矛头直指大批自己吸食并包庇他人吸食、贩卖鸦片以自肥的官吏。道光皇帝将这个奏折发交吉林、黑龙江、盛京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引发了关于鸦片问题的第二次大论争。

从29篇回奏看，没有人公开反对严禁，而是从不同角度提出严禁的办法。

赞同禁烟不赞同“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占大多数。其中，直隶总督琦善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琦善重申封关禁海政策，提出只要不准通商，鸦片就不禁自止了。他反对重治吸食，认为吸食者难以计数，不可胜诛，应听任吸食者自己禁烟，待一年半载后，买不到鸦片就自然戒掉了。陕甘总督瑚松等则认为，治国之道，安内必先攘外，主张帅船巡查海口缉私，以杜夹带之弊。

赞同黄爵滋主张的仅有8个人，人少势小，但他们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其中，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复奏，对重治吸食的主张大加赞许，并作了重要补充。他进一步说明：重治吸食，挽救漏银，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自身，“迨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兵和饷是清朝统治者的命根子，林则徐这段话击

中了清王朝的要害，使道光皇帝为之震动。

经过论争，处在犹豫不决境地的道光皇帝态度日趋明朗。他决定摒弃弛禁主张，采取严禁之法，并逐渐形成了内外并治，也就是以杜绝来源为先的查办海口走私，与重治国内兴贩开馆者、吸食者结合起来的禁烟主张。

同年10月25日，庄亲王奕劻、辅国公溥喜因赴僧尼庙内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接着，道光皇帝又谕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将两年前首倡弛禁的许乃济降级休致。于是在1838年前后，逐渐掀起了全国性的禁烟热潮。

## 七、各地禁烟热潮

在清政府高级官员内部对鸦片问题的争论尚未定局之时，许多地区的禁烟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湖广总督林则徐率先在所管辖的湖北等地区大力推行禁烟政策。他的禁烟措施，诚如他在奏文《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所陈述的：

1、为禁绝馋根，必须把烟具收缴净尽，特别是烟具和烟斗。

2、为避免因循观望，颁布告示劝令自新。把一年革瘾之期以3个月为一期分成四个阶段。自颁文之日起，前3个月为第一阶段，此期内改悔断绝、赴官投首、呈缴烟具及余烟，并出具甘结保证者，准予免罪。在第二、三、四阶段内投首者，罪名酌量减轻。下投首者，一经发觉，加重处置。如不知悔改，置诸死地，不足为惜。

3、为断源截流，必须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并分别勒令限期缴烟具结。

4、为禁止衙门吸食，必须对文武属员中违犯禁令的上司，规定失察处分。逾期失察者，即行革职或降调。

5、为禁止地方吸食，必须责成地保、牌头、甲长等负责稽查奸宄，检查烟土、烟膏、烟具。不举发者与正犯同罪。

6、为使事实确凿无误，必须讲求审断之法。提出要知吸烟者虚实，原不在审而在熬。时间一长，有瘾之人就会原形毕露。

从以上措施看，林则徐的禁烟是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宽严相济的精神相结合为特色的。他抱定禁绝鸦片的宗旨，脚踏实地的投入禁烟活动。他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禁烟局，张贴禁烟布告，并捐出自己的俸禄配制成戒烟药丸，广为散发。经努力，短期内在武汉三镇收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烟枪、烟斗二千余杆。林则徐率部下将所收烟枪、烟斗逐一查明，先用刀劈，继用火烧；将烟土、烟膏拌以桐油，烧透后投入江心。

在禁烟活动的威慑下，不少鸦片贩子闻风远窜，许多吸食者开始戒绝。禁烟之举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一些老人和妇女纷纷在路旁向林则徐叩头致谢，并且说她们的丈夫、儿子久患烟瘾，今日有幸服药断绝，身体渐渐强壮了。禁烟活动的初步成效极大地鼓舞了林则徐，增强了他的信心。他断言，只要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吸食鸦片的风气是可以改变的。

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原来倾向弛禁的邓廷桢等人也改变态度，成为禁烟活动的推动者。他一方面传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限期撤走停泊在伶仃洋一带的外国鸦片趸船；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严禁扒龙、快蟹一类船只靠近趸船，违抗者立即围剿。他还认真查抄广州的窑口，逮捕了2千多名吸毒、

贩毒的罪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隔断了中外烟贩的联系，禁烟活动开始见效。据记载：“在官船攻打鸦片帆船的一次战斗中，许多人被击毙，一百多箱货物（指鸦片）被毁掉。沿海船队不得不折回伶仃根据地，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广州监狱里的烟犯不少于二千人，每天都有3、4个人因为抽不到鸦片而死掉”。鸦片贩子查顿评论道：广州日前“已经看不见1支烟枪，1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1个人打听鸦片，查禁1天比1天普遍”。

1838年下半年，道光皇帝支持禁烟的态度明朗后，不少省份开始搜缴鸦片。仅天津、广西、云南就查获鸦片近20万两，浙江铲除罂粟苗1300亩。禁烟活动的良好开端，使人为之振奋。

受鸦片毒害最深的广东人民对鸦片走私活动十分痛恨，他们自发地采用各种方式投入禁烟斗争。渔民们组织在一起，发现走私的趸船后，就立即吹响螺号，召集渔船，前后截击或顺风纵火，烧毁烟船，捉拿烟贩。他们把这种举动为“蒸大蟹”。他们还到伶仃洋去“打鬼趸”，就是袭击鸦片趸船。农民们也组织起来，捣毁转贩鸦片的“窑口”和吸食鸦片的烟馆。广州沙角北面的广济圩，是烟贩和烟鬼们聚集的地方。一天，正当烟馆里烟雾弥漫的时候，附近的农民突然闯进去，砸碎烟灯，踩断烟枪、捆起烟贩示众，烟鬼们吓得四散而逃，围观的人们个个拍手叫好。

1838年12月12日，广州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反对鸦片侵略的示威活动。这一天，广州地方官吏押着中国烟贩冯安刚在商馆前面的广场上执行绞刑时，美国领事降下国旗对此举表示抗议。随后，英美商人冲出来捣乱刑场、拆毁绞架、殴打执行人。这一情况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当天下午，闻讯赶来的上万民众包围了英美商馆，表示抗议。可是，英美商人竟继续挑衅，用棍棒逢人便打。愤怒的民众奋起回击，拾起砖头、瓦块，雨点般地砸向商馆的玻璃窗，拆毁了栏杆。英美商人缩在商馆里不敢露面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禁烟热潮，预示着中国人民严禁鸦片的风雨就要来临了。

## 八、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

在全国各地禁烟运动的热潮中，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奏文中的深谋远虑之言和毫不畏惧的禁烟举动非常赏识，下令召林则徐进京见驾。

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北京。从第二天起，他一连8天被召见。道光皇帝还宣旨授予林则徐“紫禁城赐骑”。准予臣下在皇宫内骑马，实属罕见，由此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但林则徐是南方人，又是文官，不善骑马，于是皇帝又特赐乘肩舆。肩舆是一种椅子轿，就是在八人抬的轿子上面放置一把椅子。坐在上面进出紫禁城，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例。以上这些荣誉足以说明，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相当满意，并对他寄予厚望。同时，道光皇帝也旨在用这些方法提高林则徐在众臣中的威望。

林则徐与道光皇帝商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林则徐后来的奏折和书信中，可以依稀看到谈话中涉及的部分内容：1、关于断绝鸦片来源，可能会引起外国干涉的议论。林则徐恳请皇帝不要为所谓“引起边衅”的流言所动摇，允许他做好防止外敌侵扰的准备。不过，他们对边衅的估计，还仅仅限于历史上有过几只兵船的局部性骚扰，未预料到会牵动全局性的大规模战争。他们对国外情况不了解，道光皇帝对外敌尤

为轻视，认为“外夷不堪一击”，示以兵威足以慑服敌人；2、林则徐指出，查办鸦片之时，关税不免暂时短绌，禁烟之后定会更加丰盈，主张将“关税陆续清减”，道光皇帝表示理解；3、林则徐建议向与贩卖鸦片有关的国家发布照会，让其停止种植、制造和贩卖鸦片。道光帝同意他到广东后，与邓廷桢酌商，草拟底稿，奏请上报。

可见，林则徐的禁烟思想经过湖广禁烟和鸦片论战的实践，有了进一步发展，禁烟的重点从重治吸食转为断绝鸦片来源。这标志着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向着反抗外国侵略的方向转变。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主张，希望依靠周密精干的林则徐，消除鸦片隐患，解救财政危机。

同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办理禁烟事宜。同日，还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令各省遵行。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林则徐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

林则徐，生于1785年8月30日，福建省侯官人。字元抚，又字少穆。他14岁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22岁时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聘请，提任书记，即文书。厦门海防同知是管理海口商贩、监放兵饷等的官吏。这时鸦片走私的流毒，已从广东扩大到福建沿海。担任书记一职的林则徐开始接触到鸦片问题。1807年，他被福建巡抚张师诚召入幕府。1811年，林则徐通过科举会试后，跻身于官场。历任编修、江西乡试副主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湖北、河南以及江宁等地布政使等官职。由于清正廉洁、精明能干，1832年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不久，又以关心民生疾苦和突出的行政才能，升任为两江总督，1837年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去办理军政大事的官吏，权力很大，但面对当时清政府内部的鸦片贩卖集团、受贿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破坏，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责任重，危险大。

在北京，一些清廷大员们或明或暗地阻挠禁烟。早在12月22日，林则徐应诏北上，途经直隶安肃县时，直隶总督琦善就特意从北京赶来，向林则徐游说，两人在行馆内谈到深夜。琦善用禁烟会引起边衅为由，企图改变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之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朝廷上不敢冒犯皇帝的尊严，罢朝后，却对林则徐面动难色，口吐危言。因此，朝野中的有识之士，很为林则徐的前途担忧。林则徐也意识到，自己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像历来的钦差大臣那样，因循了事，保全地位；一是为民族洗刷耻辱，而身蹈危机。林则徐毅然选择了后者。

启程前，林则徐的好友龚自珍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名为送行，实为鼓励林则徐严加惩办鸦片烟贩和吸食鸦片者，并提醒他注意策略，谨慎从事，建议他加强战备，以武力为后盾，克敌制胜。对于阻碍禁烟的势力，龚自珍建议林则徐杀一儆百，决不手软。否则，“事机一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最终，他热切地期望禁烟成功后，由一省之治，进而出现中国十八行省皆物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龚自珍的主张与琦善等人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龚自珍还请求随从林则徐一道南下广东，为禁烟出力。林则徐深知禁烟斗争的残酷，不忍朋友同去赴汤蹈火，托友向龚自珍婉言劝阻。

林则徐出京前夕致函友人，明确表示：这次赴任将“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誓为祖国“除此巨患，拔本塞源”。铮铮话语，铿锵有力，表现了林则徐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在北风呼啸的季节，踏上了奔向禁烟运动的前哨阵地——广东的征途。出发的当天，他从京郊良乡传牌到广东省城，通告此行并没有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只有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六名，俱系步行跟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冒名顶替者，立即拿究。所雇民夫和轿夫的价钱，均已自行发给，不许在各驿站索取分毫，该州县也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夜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随行人员，不得暗收站规、门包。命令沿途各州县、驿站官吏照此办理。清官上任，一洗官场奢华恶俗，深得民心。

一路上，他拜会沿途的地方官吏，会晤由南向北的过路官员，了解有关鸦片走私的情况。这样，林则徐还在路途上，就对广东走私的主要地点，中外重要烟贩的姓名、活动有了大致了解。他密令广东官吏按照所列名单，把已调查清楚的61名烟贩迅速缉捕归案，等他到广东后亲自审理。这些烟贩中，不少是多年来经营快蟹、扒龙的人，也有清政府衙门内的当差、士兵。

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的消息传到广东，犹如晴天霹雳，令中外烟贩惊恐万状。大鸦片贩子查顿匆忙逃到澳门，以观风向，英美鸦片趸船也陆续离开伶仃洋，暂避锋芒。

2月22日，林则徐在广西接到了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来信。邓廷桢等闻知林则徐赴广的消息，兴奋异常，他在信中表示，愿和林则徐“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并发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从此，邓廷桢成了林则徐的得力助手。他们携手合作，力挽狂澜，共同领导了反对鸦片侵略的禁烟运动。

## 九、收缴鸦片，杜绝弊源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乘船抵达目的地广州。船只停泊于天字码头后，他在沿江两岸民众寂静、肃穆的气氛中，以及充满企盼的目光注视下，从容登岸。当时，在临江一条双桅帆船上看到这一情景的美国人威廉·亨德描述说：林则徐“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定，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60岁”。准确地讲，这一年林则徐55岁。

林则徐在接官亭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等人会晤后，得知广东地区已着手拿获烟犯，查禁工作颇有声势，信心倍增。他当即下令外洋水师，查清外国鸦片趸船的踪，乘势驱逐。

第二天，林则徐命令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的门口悬挂告示，宣布：所有随从人员，不许擅离左右；派往行辕供事的书吏，在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借端出入；凡文武官员因公禀报者，随时接见。

为摸清鸦片流毒的症结，林则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把有关行商、散商集中到行辕附近寄宿，随时问话；广泛会见文武官员、友人、旧属、同乡，了解情况；雇佣两个长期在商馆为外商烹调的厨子到行辕内备办伙食，就近查询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身穿便服到船户、渔家中去，收集反映。他还借“观风试”的名义，召集书院的青年学生进行考试。不过，这次考试与以往不同，试卷里面写道：可以不答试题，但必须把自己知道烟贩的行为、住址和活动情况写明，对官兵走私、受贿的内幕，更要写清，不得隐瞒。书院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知道的信息多，又大都思想活跃，对鸦片走私深恶痛绝，因此为林则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林则徐在工作中，发现自己对外国的局势缺乏了解，而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他派人广为搜集广州、澳门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包括商业情报和传教小册子，介绍西方史地的书籍。这些资料，大部分是用英文写成的。林则徐不懂英文，当时懂得英文的仅仅是少数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洋行买办、引水、通事，以及在外国教会学校里读书的学生。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官府和封建士大夫不屑一顾。为了探求新知，掌握国外情况，林则徐求贤若渴，大胆地招募他们在行辕里翻译西方书报。

通过各种周密、细致的工作，林则徐对如何禁绝鸦片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他多次会见邓廷桢、怡良、关天培等人，共商禁烟大事。他认为，广东地区鸦片烟贩、吸食者众多的原因是外国烟贩走私鸦片，他们“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由何而吸”。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把“必先重治吸食”的禁烟方针，更正为“以断绝鸦片为首务”的方针。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他们确定了禁烟方针。这个方针可以归纳为两点，即缴烟和具结。用林则徐自己的话，就是“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具结，就是写出永不带鸦片来中国的保证书。

那时，英国鸦片贩子向来无视中国法令，鸦片烟土又不放在广州，主要是存储在伶仃洋面的趸船上。在这种情况下限令他们把鸦片全部缴出来，谈何容易！为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林则徐制订了一套周密的办法：

- 1、对鸦片贩子严格对待，打击鸦片贩子的侥幸心理和对中国法令的轻视。
- 2、指责串通英国鸦片贩子、藏垢纳污的行商，并令他们传谕鸦片烟贩缴烟具结，转变立场为祖国服务。
- 3、做好同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以及鸦片贩子的阻挠活动作斗争的充分准备。

3月18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等在钦差行辕传见十三行洋商。

十三行洋商，是清政府指定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此时共有十一家，即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容有光的安昌行。这些洋商，多年来暗中帮助外商贩卖鸦片，走私白银，刺探消息，从中得脏致富，林则徐早已探明洋商的底细，怒不可遏。

林则徐愤怒地斥责洋商堕落失职的可耻行为，指出政府设立公行，是为了杜私通而防禁物。他命令洋商将禁烟告示——《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速往商馆传达给外商，限3日内回复。

洋商匆匆赶到十三行公所传见外商，由通事用英语宣布林则徐的谕令。林则徐在谕令中指出，鸦片走私“骗人财而害人命”，外国鸦片贩子用“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责令他们将鸦片全数缴出，并填写中、英两种文字的保证书，声明以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如遵令在三日内回复，则奏请皇帝既往不咎，酌情奖励。以后再犯，既应遵照新例，一律从重惩罚。他庄严地宣布了自己的禁毒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还警告说：鸦片走私的恶劣行径，已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如果鸦片贩子不知改悔，惟利是图，将会受到严厉制裁。

同一天，粤海关监督豫坤发布通告，暂时禁止外商赴澳门。

尽管时间紧，风声急，但外国鸦片贩子仍未回复缴烟的数目和时间。

3月21日，是林则徐指定的最后一天期限。外商商会开会研讨对策，企图按照以往的惯例，以一张不再和鸦片发生关系的保证书和一笔对方满意的贿赂蒙混过关。但是，这种应急妙术失灵了。当晚，洋商赶到商馆传达林则徐的回谕：如果不马上答应呈缴鸦片，明早十时亲自到十三行公所办理一切事宜，并首先审讯洋商，予以法办。于是，外商商会又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次日如何答复。他们邀请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到会，探询林则徐的真实用意。当得知林则徐不受贿赂，拖延抵赖也无济于事时，才勉强同意拼凑1037箱鸦片上缴。

22日，林则徐在接到外国烟贩答应缴烟1037箱呈报的同时，又收到了广州地方官员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商人中绝大多数愿意缴烟，被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阻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正在意图免缴。林则徐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同时，又命邓廷桢传讯外商，驳回外国鸦片贩子的呈报。

林则徐的上述举动，当属中国的内政问题。然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得讯后，却蓄意把中国正当的反烟毒、反走私的斗争变成两国政府之间的争执，疯狂地掀起战争叫器。他发出通知，命令所有停泊在洋面上的英国船只，开到香港去，并挂起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攻击。与此同时，他还气势汹汹地致函邓廷桢，对中国方面加强海防的措施横加指责，甚至以挑衅的口吻问道：“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作战？”

24日，义律星夜乘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恿鸦片贩子不要缴烟，并于当天晚上，指使颠地逃跑。商馆里的中国雇员发现后，联络渔民把他截回。事后，义律召集全体外商开会，叫嚷外商统一行动，对抗中国的禁烟令，并为他们打气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最后一息”。他还把颠地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保护。就这样，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以及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的肮脏关系，把义律心中最激烈、最卑劣的感情唤起来了，他不顾一切地维护鸦片贩子的利益。

精明善断的林则徐，认识到这时抗拒禁烟的人，已不是颠地，而是义律。按照清政府违抗法令即行封舱的惯例，林则徐下令停止贸易并派兵封锁商馆，撤掉商馆里所有中国雇员，断绝商馆与趸船之间的交通。自投罗网的义律，成了瓮中之鳖。3月26日，林则徐通告义律，外商一经将趸船烟土全数缴出，不仅一切恢复正常，而且以后各外商均可在华从事正当贸易。林则徐的措施，仁至义尽、有理有节。可是，义律和鸦片贩子们却无中生有，声称中国政府的上述措施是“越轨行为”，“英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处在十分可怕的危险之中”。事实上，商馆不是领事馆，中国政府官吏为维护本国正当利益，令犯罪分子缴出违禁品，采取暂时封锁内外联系的措施，在国际法上也是无可非议的。

封舱、封馆很快取得了积极效果，3月25日当天，就有美国商人具结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违反，甘受惩罚”。

义律继续顽抗。他要求林则徐颁发护照，并威胁说：如果不发给护照，就认定本国的人和船已被强行扣留，就要采取相应行动。林则徐的回答冷静而坚决：“一定要先缴烟，然后自然会颁给护照。”义律黔驴技穷了！3月27日，他被迫命令英国商人缴烟，但与此同时，他又节外生枝地表示：全部鸦片将由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名义转交给中国政府，保证烟价以后全部由英

国政府赔偿。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政府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变成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交涉，为以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借口。义律还以英国政府赔偿损失的保证劝告美国鸦片贩子同时缴烟。他的险恶用心，在于联合美国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

林则徐为防止义律不讲信义，采取了以下措施：缴出鸦片一半，允许商馆使用中国雇员；缴出四分之二，酌情允许水上往来；缴出四分之三，允许开舱贸易；全部缴出后，一切恢复正常。

4月3日，林则徐派员与义律派出的代表一道赴虎门等处缴烟。11日，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亲自到虎门监收。截至5月21日，共收缴鸦片19187箱零2119袋。其中，除美国烟贩子的1540箱外，全部是英国烟贩的鸦片。

林则徐收缴鸦片的胜利，在清政府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如同惊雷一般，轰得珠江口岸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船纷纷逃窜。林则徐以无比自豪的心情，描述了这一令人激动的情景：

“春雷轰破零丁穴，笑厦楼气尽，无复恢然。沙角台高，敌帆收向天边。”

## 十、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从趸船上收缴来的鸦片，全部堆放在虎门寨下水师提署和附近的民房庙宇内。由于存贮鸦片的烟箱每个长约3尺，高1.5尺，宽1.5尺，每个大房间才能堆放四、五百箱。房屋不够存放，只好按贮烟地点分成数片，每片房屋外另筑围墙，搭起高棚，贮放烟箱。为防范有人盗窃，林则徐还派兵昼夜巡逻。

如何处理这些数量庞大的鸦片呢？起初，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曾打算把它们解往北京，由朝廷验明烧毁，后又考虑到路途遥远，容易被偷漏抽换，出现意外，于是呈请皇帝定夺。5月30日，道光皇帝谕令就地烧毁。

早在等候道光帝谕旨的同时，林则徐就广咨博采，寻找大量销毁鸦片的有效方法。在湖广禁烟时期，林则徐曾采用桐油焚化法，但焚烧过之后，仍有十分之二、三的鸦片残膏渗入地内，流毒难清。经过访查，林则徐得知鸦片最怕石灰和盐卤。鸦片投入到石灰和盐卤中去后，很快就会变成渣沫，不能再收回成膏。但是，这种灰、盐煮化的方法虽比焚化科学，却不适合大规模销毁。林则徐和关天培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使用挖池浸化的方法。他们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掘了两个长宽各15丈的方形地子，池底平铺石板，四周树立栅栏；池前开一涵洞，作排泻鸦片渣沫用；池后挖一水沟，以便引水冲刷池子。

6月3日，久雨初晴，阳光灿烂。虎门寨下，观者如潮；山前山后，哨兵林立。下午2时许，林则徐由广东巡抚怡良和粤海关监督豫堃陪同，登上礼台。礼台上，挂着麒麟帐，铺着红地毯。礼台前，飘着一面黄绫长幡，上面标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场面庄严，气氛热烈。林则徐翘首遥望南天，心潮澎湃，他高声下令焚烟开始。顿时，轰隆的礼炮齐鸣，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只见文武官员督率士兵和民工先由水沟放水入池，然后撒下盐巴，把劈箱过秤后的鸦片，逐个切成四小瓣，抛入池内，经过半天的浸泡，再将一担担烧透了的石灰倒下去。民夫们站在池子的跳板上，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戳。倾刻间，销烟池内

滚沸如汤，不炊自燃。一池销毁完毕，马上打开涵洞，冲刷入海。另一池又开始浸化销毁。夕阳西垂，被焚毁的鸦片化成渣沫，随着退潮的海水，流入大洋。

前来观看销烟壮举的中国民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人群中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根据道光皇帝关于准许外国人“共见共闻”的谕旨，林则徐在销烟前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前往参观。当时，不少外国人是怀着怀疑的眼光看待禁烟运动的。譬如，义律就根本不相信林则徐会销毁鸦片。当缴烟达到半数时，义律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他估计这批鸦片将作为政府专卖，而使今后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在广州商馆里的许多外国人曾断言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

允许外国人参观销烟经过的通告发布后，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经和眷属、传教士裨治之、商船“马利逊”号船长弁逊等约10人，乘坐“马利逊”号，从澳门出发，赶往虎门参观，17日上午抵达销烟地点。林则徐请他们走进栅栏内、销烟池前，观察销烟的全过程。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办事认真的态度。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经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面前，摘帽敛手，表示敬佩。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上撰文说：

“环绕我们的场面全都是令人高兴的，给人印象相当深刻。”

“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测，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加忠实的了。”

的确，在当时贪污腐化的官场中，查禁鸦片已成为勒索贿赂的手段。林则徐这样认真、果断、彻底地销毁鸦片，实为难能可贵。他不愧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英雄！他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认真严肃的作风，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自尊。

为了向外国人表明中国禁烟运动的政策和决心，林则徐在销烟池畔的棚厂会见了他们。林则徐宣称：中国政府对今后走私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于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商，则将给以恩惠，并且，走私决不容牵累合法贸易。他预计到英国侵略者不会就此干休，甚至可能进行武装挑衅，但他没有退缩。他代表中国人民义正辞严地宣告：

“我们不怕战争！”

整个销烟过程历时20天，除奏准8箱作为样品保留外，共销毁19197箱，零2119袋，鸦片净重2376254斤。

6月25日，林则徐、邓廷桢满怀胜利的喜悦，登舟离开虎门海滩，回到广州。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 十一、战争阴云密布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发出了一片狂热的战争喧嚣。

英国资产阶级在鸦片走私中受益最大的是鸦片商人和棉纺织商人。鸦片商人从印度向中国偷运鸦片的过程中，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到中国烟贩的

现金，从事的是一本万利的交易。他们绝不甘心被中国人民阻断这条“致富”之路。

英国企业家、进出口商、航业资本家，尤其是棉纺织资本家，在鸦片贸易中得到了很大好处。他们把本国的棉纺织品运往印度大量倾销，印度则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纺织品。所以，英国棉纺织品的销售量是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而增加的。鸦片贸易在为整个资产阶级带来血腥暴利的同时，也为英国政府带来了重要的财政收入。因此，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可放弃的原则。

8月7日，鸦片走私集团和棉纺织集团的代表人物召开紧急会议，并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策划侵华战争。他们叫嚷：中国的禁烟给英国政府提供了战争机会，英国可以借战胜的余威，强迫中国接受所提出的条件。会后，他们晋见外交大臣巴麦尊，密谋侵华战争。巴麦尊表示：政府将采取强硬态度，并派出足够的海军，使中国感到威胁。

9月1日，大鸦片贩子查顿回到英国后，携带从中国刺探的地图、表册等资料晋见巴麦尊，提出了具体作战方案。他指出：英国出兵的目的是进到北京附近，直接向中国皇帝提出要求道歉、通商、赔偿鸦片损失等条件。他还向瓦伦提供资料，写出了一本名为《鸦片问题》的小册子，大肆宣传中国政府虐待英国商民，压迫英国官员等事实，煽动英国社会敌视中国的情绪。在鸦片贩子的策动下，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等大城市商会，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贩子，也先后致函英国政府，策动战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出，应以禁烟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对中国进行“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1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他还建议英国军队立即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到运河口的长江江面。印度的鸦片贩子则以鸦片“贸易”同政府有密切关系为由，要求政府尽快赔偿其损失。

在鸦片贩子和棉纺织资本家等人的策动下，英国政府认为发动对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1839年9月21日，巴麦尊接到义律的报告后立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开头先来一个打击，然后再说道理”。11月18日，巴麦尊秘密通知义律，英国政府准备派远征军来华，到时候将封锁广州和白河，占据舟山，并拘捕中国船只。

林则徐也做好了应战准备。他意识到英国会借中国禁烟扩大事态，进行武力挑衅。因此，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整顿海防。他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察看了海口形势，在虎门一带海口要隘，加强和修筑了防御工事。在外船进口的必经之地——武山和横档山之间，安设了两道木排铁链，并在武山添了一座炮台，安设了六十门大炮，其他海防要地，也添置了武器装备。

林则徐和关天培还大力整顿军队，操练水师。他们还招募了渔民和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壮丁五千人，编成水勇，教给他们袭击敌人的技能，准备配合水师与敌作战。林则徐深信民心可贵，发布告示公开号召：如果英军兵船进入内河，允许人人持刀痛杀。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兵在九龙尖沙嘴喝酒行凶，打死了村民林维喜，打伤多人。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严加拒绝。于是，林则徐通知澳门居民，严禁向英国人供应柴米油盐等物，撤出为英商服务的中国雇员。澳门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英国人失去了在澳门生存的基本保障，只好溜到海

面上停泊的商船中去躲避。

8月，英国巡洋舰“窝拉疑”号等战舰开到了广东海面。这一举动刺激了义律的战争欲。他的态度又强硬了起来。他在要求英国政府迅速发动对华战争的同时，在广州口外屡次挑起战端。林则徐坚决回击。从9月到11月的三个月时间内，中国军队在九龙山、穿鼻洋和珠江口官涌一带，连续击退了英军八次进攻。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乔治·懿律兼任远征军司令。英国政府还拟定了《对华条约草案》，其中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开放通商口岸、割占岛屿、设置领事、索取军费、自由贸易等条款，接着，又通过了对华出兵的决议案。

这一年的4月，英政府拼凑了一支载兵400名由540门大炮装备的48艘舰船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6月，英国侵略军的舰队陆续扑到波涛汹涌的广东海面，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因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政府保护血腥的鸦片贸易，所以这场战争叫做鸦片战争。

英雄的中国人民，毅然举起抗英大旗，投入了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独立的反侵略战争。

